

≡ 明末清初艺术史 研究文集

纪念顾炎武诞辰四百周年

顾工 主编

CTS 湖南美术出版社

≡ 明末清初艺术史 研究文集

纪念顾炎武诞辰四百周年

顾工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末清初艺术史研究文集 / 顾工主编. — 长沙 :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7-5356-6465-5

I. ①明… II. ①顾… III. ①艺术史—中国—明清时
代—文集 IV. ①J120.94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76642号

明末清初艺术史研究文集

出版人: 李小山

主 编: 顾 工

责任编辑: 胡紫桂 邹方斌

装帧设计: 造房

版式设计: 田 飞 彭 莹

出版发行: 湖南美术出版社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宁乡县金洲新区泉洲北路100号)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7.75

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56-6465-5

定 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邮购联系: 0731-84787105 邮编: 410016

网 址: <http://www.arts-press.com/>

电子邮箱: market@arts-press.com

如有倒装、破损、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731-87878875

序

昆山千灯镇，是江南闻名的水乡古镇。一条千灯浦由南向北穿越古镇中央，汇入吴淞江。在千灯浦的旁边，有一座古色古香的五进院落，就是明清之际著名爱国学者顾炎武的故居。

顾炎武身在昆山，心系天下。在那个天崩地裂、山河破碎的时代，清军入关以后剃发易服的命令，无情地击碎了汉族知识分子的文化认同感。所以顾炎武提出“有亡国，有亡天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面对政治的血腥强权，知识分子所能做的，唯有通过传承文化来保天下。在抗清斗争失败后，顾炎武以嗣母王氏遗言“读书隐居，无仕二姓”作为终生坚守的信条。他的学问既精且博，传世著作多达三十五种。在后世学人看来，顾炎武是公认的“汉学”开山之祖，其音韵、地理之学更是古今独步。他长期流亡北方的经历，使得他能够实地考察地理水利、金石文字，以金石证经史，对清代学术产生巨大影响。康熙二十一年卒于山西曲沃，归葬昆山故里。

明末清初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高峰，出现了许多杰出的学者、诗人和艺术家。与顾炎武同乡、同龄，合称“归奇顾怪”的归庄，出生于文学书画世家，精草书，擅画竹。顾炎武好友、山西高士傅山，医术精湛，书法古拙。顾炎武的远房亲戚顾苓，是清初吴门最重要的篆刻家之一。流寓金陵的昆山人龚贤，也是清初重要的遗民诗人和画家。其他如明末书坛“三株树”王铎、倪元璐、黄道周，画坛“四僧”浙江、髡残、八大、石涛，“四王”中的王时敏、王鉴，著名

印学家周亮工，书法家宋曹，等等，都是与顾炎武同时代的艺术大家。

今年正逢顾炎武诞辰四百周年。为纪念这位先贤，昆山书画院以繁荣创作、弘扬学术为旨归，即将举办“亭林风骨——纪念顾炎武诞辰四百周年书画作品展”和“顾炎武时代的艺术——明末清初艺术史讲坛”。这本论文集汇聚了全国各地十几位专家的研究成果，既勾勒了明末清初艺术史的轮廓，又展现出许多精彩动人的细节。希望它能对当代的艺术史研究有所助益。

莫全明

2013年6月

目录

明末“三株树”考论 / 薛龙春	2
浪漫主义书风的绝响——傅山书法之意义 / 叶鹏飞	29
坚守信念与尴尬实践——论傅山“四宁四毋”书学观与创作的矛盾 / 蔡显良 ...	39
顾苓事迹考证札记 / 周新月	49
论浙江思想中的儒道佛因素及其画风的影响 / 吕少卿	86
周亮工著作考 / 朱天曙	98
髡残抗清问题考辨 / 吕晓	124
读归庄《墨竹诗翰册》 / 陆家衡	144
龚贤的身世、性格与绘画思想 / 顾工	154
宋曹交游考略 / 刘东芹	168
八大山人的“涉事”观 / 朱良志	183
17世纪下半叶的黄山图版画与“徽州意识”的重建 / 邱才桢	208
绘画史中“四王”概念的出现——读《吴越所见书画录》 / 黄小峰	233

目录

明末“三株树”考论 / 薛龙春	2
浪漫主义书风的绝响——傅山书法之意义 / 叶鹏飞	29
坚守信念与尴尬实践——论傅山“四宁四毋”书学观与创作的矛盾 / 蔡显良 ...	39
顾苓事迹考证札记 / 周新月	49
论浙江思想中的儒道佛因素及对其画风的影响 / 吕少卿	86
周亮工著作考 / 朱天曙	98
髡残抗清问题考辨 / 吕晓	124
读归庄《墨竹诗翰册》 / 陆家衡	144
龚贤的身世、性格与绘画思想 / 顾工	154
宋曹交游考略 / 刘东芹	168
八大山人的“涉事”观 / 朱良志	183
17世纪下半叶的黄山图版画与“徽州意识”的重建 / 邱才桢	208
绘画史中“四王”概念的出现——读《吴越所见书画录》 / 黄小峰	233

≡ 明末“三株树”考论

薛龙春

王铎、倪元璐与黄道周都是明代董其昌之后最重要的书法家，他们与稍早的张瑞图共同创造了晚明书法史上震人心目的巨轴行草风气。三人同是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又同时进入翰林院。黄道周在《王觉斯初集》序言中称当年六十六位庶吉士之中，只有王铎、倪元璐与他最为乳合，三人“盟肝胆，孚意气，砥砺廉隅，又栖止同笔研，为文章”，赞赏他们的人呼为“三株树”，嫉妒他们的人则称他们是“三狂人”。¹这是广为人知的材料。从黄道周的描述可知，王铎与倪、黄二人相交之初，甚为契合。但他们的交往活动如何？友谊是否维持终身？尚需更为细致的研究。

论者常常提醒读者，王铎尝与倪、黄相约攻书。然稽诸载籍，此说实为子虚。其时文人所重者，只有事功与立言，黄道周视书法为学问中的末事，岂能以此为留意？事实上，王铎与倪、黄不仅书法风格不同，对于书法的态度、书学的观念亦大相径庭。黄道周对于王铎“看其五十自化”的评论，²常被当作一种先见，为王铎研究者所乐道。然细绎黄氏此语的上下文，他在书法上所推重的实为倪元璐，而非王铎。

此外，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文艺以人传”“书以人重”的观念深入人心。王铎的投降异族与倪、黄的殉节死难形成鲜明对比，但尽管他的政治人格有

重大污点，传世书作的数量却远逾倪、黄二人的总和。也就是说，大节有亏并未实际影响王铎书作的收藏与流传。繇是，则传统的“书以人重”的观念，其现实印证亦大可一问。

一、王铎与倪、黄的同与不同

明亡以前，王铎、倪元璐与黄道周在政治上都极力营造忠谏形象，以清流著称。不屈服于政治威权（有时甚至是极端的，如黄道周），不仅是儒家政治伦理的内在要求，也是晚明士子塑造公众形象的有效举措，当廷抗疏，不仅是一种自我确认的方式，也易于获得极高的褒奖。³三人入仕之初，正是魏忠贤势力鼎盛之际，魏以东林为仇讎，一再制造门户冲突。天启间，王铎的同年进士文震孟、郑鄮因为弹劾魏党遭削职，黄道周此时也曾计划上疏击珰，然未果。⁴王铎则约同年进士郑之玄与黄锦，辞修为魏阉歌功颂德的《三朝要典》。崇祯即位之后，立即着手清洗阉党，倪元璐时奏焚毁《三朝要典》，弹劾魏党杨维垣，并为东林党辩护，成为一时正人之领袖，有人甚至以他的出处来预卜世道的盛衰。⁵他们之间相互鼓舞，耸动为一时声气。如王铎在《规倪鸿宝》一文中，赞扬倪氏“文实坚定，志意鯁笃，可称旷代之才”，并以反语的方式表达出对于倪元璐抗魏党、亲贤人、强项不下的激赏。⁶

因为时常当廷直谏，发逆鳞之论，王铎与倪、黄都没有得到实际的重用。崇祯九年（1636），王铎因不合阁臣温体仁、吴宗达，调任南京冷曹。⁷两年后，因经筵进讲《唯天下至圣章》，旁及时事，口出“白骨如林”之语，又遭崇祯帝切责。此后因在“剿”“抚”问题上反对阁臣杨嗣昌，险遭廷杖。《亡妻一品夫人马氏行状》：

方余为亚卿时，武陵杨公主剿寇事，寇益猖獗不可制。无敢言者。余疏上十余日，不下传，武陵熾朝，命廷杖。余家中臧获大小咸哭，余以棺敛事嘱夫人，夫人恬然曰：君为国家，即杖死，不失为忠臣。无忧也，戒家人勿哭。寻得宽宥。⁸

崇祯十三年（1640）九月，王铎受命任南礼部尚书，但因丁艰与避难，直到明亡都未正式赴任。倪元璐亦好献谏言，崇祯元年为保护东林党，他上疏弹劾

魏忠贤党人杨维垣，在疏词中，他质问道：“以东林为邪党，将以何者名崔（呈秀）、魏（忠贤）？崔、魏既邪党矣，击忠贤、呈秀者又邪党乎哉？”⁹崇祯九年，倪因事为温体仁所攻，罢官家居七年，直到崇祯十五年（1642）冬方应诏入京。黄道周的政治生涯也是数起数落。崇祯初疏救钱龙锡，遭降调。后遭疾求去，濒行疏陈朝中弊端，直指大学士周延儒、温体仁用人行事唯求报复，酿成门户之祸，被斥为民。复官之后，因崇祯用杨嗣昌等人为阁臣，黄道周再次上疏弹劾，言辞激烈，有“臣今日不尽言，臣负陛下，陛下今日杀臣，陛下负臣”之语，遭削籍，并逮下刑部狱，谪戍广西。¹⁰

论者对于王铎与黄道周、倪元璐的政治人格评价虽然不同，但对他们政治上的无能却等而视之。在明人的记载中，王铎居官没有任何业绩，时论亦以为不堪重任。弘光时，谈迁曾对吏部尚书张慎言说：“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为宰相则不足，孟津是也。”张对此表示赞同。¹¹《明季南略》记载，弘光元年（1645）四月二十八日，弘光帝召对群臣，在清人窥江之际，王铎居然请求讲学。弘光帝冷冷地回答：“且过端午。”对于王铎“讲学”的请求，后人曾有这样的揶揄：“岂欲赋诗退敌耶？抑欲戎服讲老子耶？”¹²黄道周的威望，也不在于他实际的政治能力，而在于他严冷方刚，不谐流俗，为公卿所畏忌。他还常常以朝堂为经筵，向人主叫板。冯班虽视黄道周为君子，但认为他不仅不容小人，亦不容君子，故不能居于上位。¹³在他看来，一味竞气的君子，对于晚明君臣相激、上下交争的政治后果是难辞其咎的。倪元璐虽曾有过掌握权枢的机会，崇祯十六年（1643）李自成占领湖广之后，崇祯倚重倪元璐，特简为户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五日三招。但倪元璐提出的解决兵饷的办法，在当时的实际情境下，根本无法操作，流于空谈。¹⁴黄宗羲直指倪元璐合三饷为一（旧饷、新饷、练饷）乃“不学无术之过”。¹⁵

明清鼎革之际，王铎与倪元璐、黄道周有着不同的人生选择。循着崇祯帝的示范，倪元璐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当天自缢，黄道周顺治三年（1646）在南京被杀，而王铎则于顺治二年（1645）五月投降大清，并于次年出仕新朝。当北京城陷之时，倪元璐将殉国当作分内之事。门人百般规劝，希望他出外募兵以图兴复。但倪氏回答说：“天下事非一人所为，以待其能者，吾姑顺受其正。”¹⁶

得知倪元璐殉难之后，黄道周说：“吾知所自处矣。”¹⁷在《为倪子新、子封兄弟题卷》中，他又写道：“何不生当尧舜时，拍肩坐讽皋陶诗。何不生当宏治与万历，坐展湖山为纸笔。”¹⁸说尽身处末世之悲哀。南都覆亡之后，黄道周依靠唐王，图谋兴复，后兵败被执。他在《授命诗》中解释自己甲申年未即时蹈死，是因为尚欲有所为，所谓“乾坤犹半壁，未忍蹈文山”。¹⁹黄道周活着的时候，与倪元璐并称“双璧”，去世之后，乡人募刻其遗书，有“明朝三百年养士之报，（方）正学而后一人”的说法。²⁰

倪、黄皆以殉节身死作为个人的道德实践与自我完成。相比之下，王铎虽大言“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天经地义，臣子之职业分也”。²¹但弘光元年（1645）五月，多铎军队进入南京时，他与钱谦益等人率众臣工出城迎降。王铎的投降，虽说有种种现实原因，²²但他变节并出仕新朝，难以逃脱内心深处的耻辱感以及后世的道德指责。晚清学者陈康祺（1840—1890）在谈到这段历史时，直斥“王铎以下诸人，何丧心病狂，至于此极”，²³将家国之难完全归咎于王铎等朝廷重臣的失职。

对于鼎革之际生死的抉择，何者更具有道德感，在清初士人中有不同角度的论争与思考。亲历甲申国变的杨士聪说：

商周之际，仅得首阳两饿夫。北都殉节，几二十人，可谓盛矣。自开辟以至今，兴亡代有，万无举朝尽死之理。²⁴

对于倪元璐等人的死节，除了大量歌赞其忠义的文字之外，在清初亦有不少非议。如计六奇（1622—？）以为“死则死耳，于国事未有济也”，²⁵张岱（1597—1679）更指责倪元璐“岂可以一死卸其责哉”？²⁶相反，清初士人在痛定思痛之际，对晚明政治的乖戾有着前所未有的批判，黄宗羲甚至提出“无君论”。²⁷既然如此，“不死”“后死”便多了一个开脱的借口。入清之后，王铎在回应明亡之后少有人臣殉节一事时，曾毫无顾忌地说：

是上剥下，下亦剥上也。操鐔而自刳其躬也，不克以天下为心。故君择臣，臣亦择君，孰肯以其身徒劳于是非黑白混淆之世，以性命日待于汤镬之前欤？！²⁸

如果说倪、黄的蹈死是一种富有激情的表达方式，那么，王铎的“臣亦择君”则表现出强烈的对于政治伦理的深层反思，与黄宗羲的“无君论”异曲同工。

二、王铎与倪、黄交往

王铎与倪元璐结识之初，情意甚为投合。考中进士的第二年，他们曾共游灯市。²⁹崇祯初年，王铎又陪倪元璐兄弟游刘馥佑（1616年进士）宅园。³⁰对于王铎的诗文，倪元璐竭力礼赞，在崇祯十年刊刻的《拟山园集》中，尚可见到倪元璐的评语。如王铎《秋居冯祯卿绿雪园，即时写怀柬侯六真、张得一、李元居、宋雨恭、梁眉居、常二如、张玉调》三十首之后，倪评曰：“吾已乐诵之深矣，前千年后千年俱无其辈，围炉拜高适，岂特上下楼之间。”又评曰：“欲勉强摘一字，自见心期，回环十句，竟不可得。子建、德祖之义，一至兹诗而废矣。”³¹当年曹植在写给好友杨修的信中，讨论修改对于文章的重要性，而倪元璐读王铎诗，竟不能易其一字，对于一位文士而言，这样的鼓吹已是无以复加。在《翰林院侍讲王铎》的制词中，倪元璐更将王铎比为张衡、谢灵运所不及。³²

王铎也曾与文震孟一起评阅倪元璐《代言选》，在所作序诗中，他将倪氏视为“莫逆”。这个文雅的浙江人，藏书之多，力学之勤，给王铎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时日不见，辄觉寂寥。他赞赏倪元璐落笔为文迥别时人，书画亦磅礴大气，与文章的浑古相一致。³³在文学上他们惺惺相惜，奉明中叶七子领袖李梦阳为文章正脉，以商周秦汉为富窟，而不屑宋元浅近之文。在他们看来，文权“与世为回轴”，晚明政治与社会秩序处在崩坏的边缘，风教凌迟，文化流失，从中可窥世运的升降。王铎与倪、黄诗文皆崇古学，这不仅需要从文学史的流变中加以解读，还蕴藏着新的文化精英对于士之品格与文化优势丧失的忧惧感，以及力挽狂澜的意志。“崇古”，或者说借崇古所提出的重建精英政治文化的主张，在晚明社会情境下已无实践之价值，但却体现出他们的自我界定和使命担当。

在早年写给倪元璐的一首赠诗中，王铎写道：

才名东观旧称贤，词赋纵横美少年。茗椀坐来斋似水，封章草就独朝天。气吞湖海千峰雨，诗压昆仑万顷烟。追忆经筵霄汉上，荃臣献纳圣人前。³⁴

对倪氏文采的倾倒溢于言表。在写给倪氏的信中，王铎更形容其文章为孙楚、杨雄所不及，拜读之下心折骨欢，觉得自己二十年来的书癖不过涂抹败絮，不堪沾沾自喜，并表示“仆于此道今示北面解甲而伏于足下”。³⁵

晚明社会极度扰攘动荡，因外出为官、丁艰、避难、罢官诸因素，王铎与倪、黄在崇祯后期见面甚稀。³⁶倪元璐家居期间，王铎有《寄倪玉汝》一诗相慰。³⁷崇祯十六年（1643）春，王铎自山东夏镇拏舟南下，而倪元璐则携义兵自浙江北上燕京。王铎此时已多年不见倪氏，一路上打探他的消息，颇欲“一陪巾履，叙艰危故人意”。到达高邮之后，王从县令处得知，倪已与他擦肩而过。二人缘慳咫尺，失之交臂。在其时写给倪的信中，王铎告知对方，自己数年来数逢亲人之丧、几陷寇城最终得以脱身、孟津故家已经荡然等种种惨状，此时正携家南下躲避寇难。他还不忘告诉倪氏，自己于崇祯戊寅（1638）清兵兵临城下时誓守城门，以及奏疏致罪杨嗣昌险遭廷杖二事，自是忠荃之臣的表白。³⁸

然而，倪元璐集中却鲜见与王铎相关的诗文，除了早年的制词《翰林院侍讲王铎》外，只有为同年郭都贤所题王铎《石交图》一诗。³⁹当然，也有可能是后人编辑时故意将之删除。不过，有两个线索可以推测倪元璐与王铎后来关系转疏。一是崇祯丙子（1636），倪元璐在一封写给文震孟的信【图1】中谈道：

孟津兄总求南司成，庶子、掌院非其所屑。其意唯恐人不据之也。数日来始知此兄营求可耻之状，不忍言之。⁴⁰

当然，王铎求为南司成一职并未成功，他当年赴南都乃任翰林院掌院。倪元璐因得知王铎的卑鄙之事，对之产生反感。二是倪元璐殉节之后，工科都给事中李清持倪元璐弟元瓚（字献汝）之揭，求谥“文正”，时任弘光次辅的王铎不悦地说：“倪年兄以身殉国，不谥亦足不朽，何必文正？予已言之仪部矣。”李清评论说，王铎话虽说得不错而意实薄，他将此视为王铎“忘君事仇之先兆”。⁴¹

王铎与黄道周的友谊，则贯穿了交往的始终。崇祯四年（1631）秋夜，黄道周乞休将南归福建，王铎与张镜心、冯元飙、黄锦、倪元璐、文安之、王锡衮（1598-1647）等人在黄斋宴集，一班同年皆以朝端正人相为砥砺，王铎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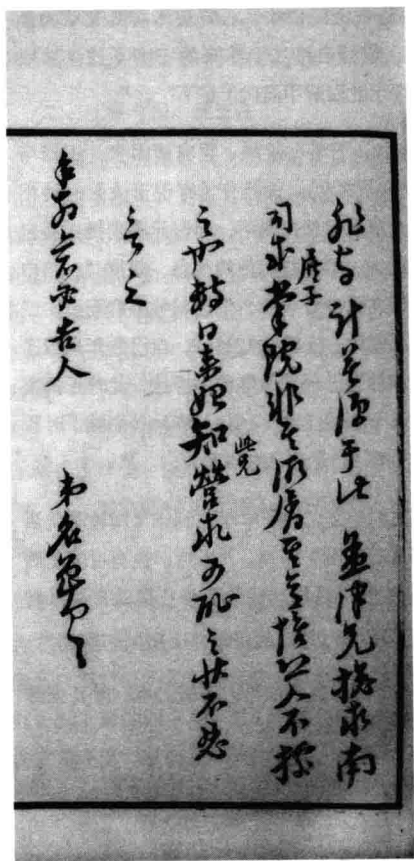


图1 倪元璐《致文震孟札》，取自《有明名贤遗翰》（光绪丁亥汉皋文渊书局刻本）

有“我曹磊砢千秋事”之句。⁴²黄道周家居期间，王铎有赠诗二首，其二云：“一时清望重朝班，古笔凭陵未易攀。……词赋千秋真大业，更将黼黻佐龙颜。”⁴³希望黄道周及早复官，而不要沉湎于著作。在李自成农民军席卷中国北方，兵锋汹汹之时，王铎又写信给黄道周：

足下早出山以揆熙载，以拯民瘼，宁仆一人之望耶？……有足下二三君子为之，可以无忧，仆辈可卧石室酣睡矣。⁴⁴

除了对于黄道周能膺大任的期待之外，王铎对于黄氏的文章最为倾服。王将黄道周、文凤翔和自己视为当日最重要的作家，明清鼎革之际，他曾对学生陈鉴说，“方今之才，幸有石斋，西有太青，中州予不敢让。”⁴⁵在他的文集中，大量收录了写给黄氏的信札。鸿雁往还中，王铎从不吝嗇对于黄氏的激赏，他称赞黄氏之作如“笈鸢囚龙，异状纷披，不区区袭开元、大历之法”，古器物只能悦人目，雅乐只能悦人耳，只有黄的文章能悦人神。⁴⁶读到黄氏的文章，令他有“今始知天大矣”的感

叹。⁴⁷他还将黄氏誉为韩愈之后一人，⁴⁸表示“从今苦追，不敢不焚舟济河”。⁴⁹在一封写给丁乾学的信中，王铎也表示，“见石斋所为，以为汪洋。”这封信中还提及，“廿三日，石斋来，约鸿宝扬榷。”⁵⁰可知在天启至崇祯初期，王铎常与黄、倪二人讨论诗文。在另一封写给黄道周的信中，王铎称“文苑中独有一黄公横行千古”，并激赏黄氏书法精良，直逼钟、王，而诗则古今罕有其俦。自己的诗与书，“虫响不足观也”。⁵¹王铎曾赠黄道周隶书诗扇，⁵²出于对黄氏书法的喜好，王亦求黄书和章《威凤》，并说因为觉得其佳，所以不得不贪。⁵³

王铎自称黄道周“深爱王子”，⁵⁴黄道周对于王铎也相当赏识。崇祯初年，在为《王觉斯初集》所作序言中，黄道周认为王铎崛起孟津，为文学正宗。⁵⁵后来有人恭维他写的诗，黄道周必力推王铎，以为非己可及。《北游录》云：

或称先生（黄道周）之诗，先生曰：吾诗未尽善，今诗四大家，孟津王觉斯铎、晋江黄太稚景昉。而推孟津甚至云。⁵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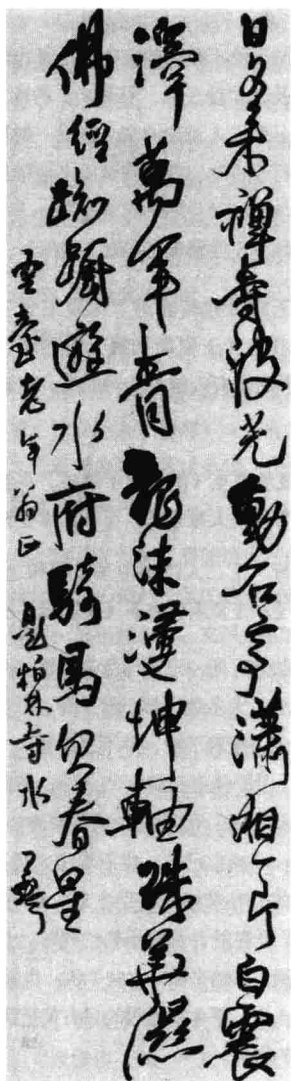
黄、王二人诗集中多有唱和之什，如黄有《答蒋若椰王觉斯各有诗见慰四章》《和王觉斯内寄》《又和见怀三章》《又和寄谢二章》诸诗。⁵⁷

弘光时期，王铎与黄道周皆接受小朝廷的任职。关于南来太子一案，其时群言汹汹，大多数人都归咎王铎，以为与马士英沆瀣一气，黄道周虽认为王铎因回乡省亲，接着丁难，并不在东筵，“无由别东朝长少仪表”，但他也不认为太子为真。⁵⁸即使在王铎变节之后，黄道周在自吊《蒿里十章》的小序中仍念念不忘他当初与王、倪等人的相互期许，谈及王铎时，只说明珠暗投，并未对之痛加指责：“鸿宝已死，觉斯埋尘，世莫宗余，开颜何用？”⁵⁹也许这是让王铎备为感激的。在黄道周去世之后，他有吊诗云：“昂藏我岂徒文客，磊砢君为不死人。”⁶⁰在赞许黄氏不朽的同时，也开脱自己说，王子也是七尺丈夫，非文人墨客者流。顺治辛卯（1651）秋，也就是王铎去世的前一年，在奉祭华山时，他又对身边人说，平生所推服的只有黄道周一人，其余则无所让。⁶¹足见他对黄道周自始至终的景仰。

王铎与倪、黄都善书，他们共同构成了今日对于晚明书法高堂大轴气度挥霍

的整体认知。但是，他们三人的书法观念与取径却大不相同。王铎一生遍学北宋米芾以上书，多次强调古难今易，晋人为江海，唐宋以来只是小流。他一生奉《褚兰亭》《圣教》与《阁帖》为主臬，并期待如米芾一般，解散二王，自立机杼。⁶²他的作品，常常通过含混的点画、顿挫的用笔和环环相扣的转承起合，来展现恣肆汪洋的粗豪气度。他还通过墨法的变化，增强书写的节奏与篇章的偶然性，大大增强了行草书（尤其是巨幅）的视觉趣味。【图2】

而黄道周论书，强调“笔正心正”，是儒家文化在书法中的体现。他所关心的并非纯粹的书法之美，而是书法背后的人格精神。⁶³黄氏自述自己年轻时随俗依傍，偶出己意，但大部分作品都不好。后来见到欧阳询的《千文》及《曼倩碑》，自觉稍稍有进。而学习钟繇楷书与索靖章草，则是他形成自家面目的关键。他从魏晋书法中得出的经验是，“当以道媚为宗，然后加之浑深，能不坠佻靡，便足上流”，否则“朴略不堪观。”⁶⁴在《题自书千字文帖后》，对古人书法“不得不如此”的书理有着深刻的认识。⁶⁵黄道周还重视书法的生动之趣，他说唐代以来书家千笔一意。有一次，他看到董



其昌所集的《戏鸿堂帖》，大为失望，在他看来，皇象、索靖以来的书法已无妩媚可寻，很多只是排比整齐而已。⁶⁶黄氏行草立轴大多盘旋翻覆，且多生拙意外之趣。【图3】黄虽自称习书不多，但他有丰富的书写经验，“从不畜代笔，缮誉俱出五指，即诸疏皆然。”⁶⁷因此，何绍基认为黄道周于精熟中出生辣，非文（徵明）、董（其昌）辈所能及。⁶⁸

倪元璐19岁时就显示出非凡的艺术才能，陈继儒见到他所写的扇面，惊为仙才。有人认为倪元璐书法一笔不肯学古人，只欲自出新意，所以显得锋棱四露，仄逼复叠。⁶⁹我们很少看到倪元璐对书之“法”的谈论，在一封与友人讨论诗歌的信中他写道：“以法正诗，不如以聪明正法，以聪明正法，是使钝士不敢言法，使钝士不敢言法，是使慧士不敢言聪明也。”⁷⁰或许正代表了他对“法”的看法。而从黄道周的评论可知，王羲之、颜真卿、苏轼等人对于倪元璐的书法都有很大影响。⁷¹倪元璐书法在结字上与黄道周有相似之处，然黄多横向取势，倪则往往纵向取势。笔力雄劲，善用枯笔顿挫，有一种高怀别致溢于笔墨之间，为他人所不及。【图4】

如前所述，王铎与倪元璐后来关系转疏，而黄、倪二人终身感情甚笃。黄、倪二人交往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发生在崇祯四年（1631）。前一年冬，黄道周因疏救前大学士钱龙锡，被疑为曲庇，后降三级调用，次年春黄道周遂三疏乞休。此时倪元璐抗疏称黄道周为古今第一词臣，愿以己职相让。故张溥云，“闽漳黄石斋先生与公（倪元璐）齿兄弟，学履、名地相等。石斋昌言，调他职，公请让官，义动朝廷。”⁷²

黄道周与倪元璐常有书法的交流。由于人格相等，书风亦较为接近，评论者素来将黄、倪并称。对于当日的书法，黄道周最欣赏的正是倪元璐，而不是王铎。崇祯壬申（1632），黄道周见到倪元璐作书，便对他人说，倪元璐魄力雄深高浑，当在颜真卿、苏轼之上，当时别人听了都很惊讶。他还预言倪元璐笔法深古，能兼苏轼、王羲之之长，数十年之后一定会与王、苏并宝当世。⁷³又说：

行草近推王觉斯，觉斯方盛年，看其五十自化。如欲骨力嶙峋，筋肉辅茂。俯仰操纵，俱不露人。抹蔡掩苏，望王逾羊。宜无如倪鸿宝者，但今肘力正